

東亞四地 書的新文化

Building a New Book Road

編輯委員：

加藤敬事(日本) 郝明義(台灣) 劉蘇里(中國) 韓淇皓(韓國)

日本、台灣、中國、韓國之間，
正在展現何種共通又相異的「書的新文化」？
四地出版人、編輯、設計者，共同尋求答案。

東亞共同出版
台灣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東亞四地：書的新文化 / 加藤敬事等編撰。--
初版。-- 臺北市：網路與書，2004[民93]
面：公分。-- (Net and Books網路與書
)

ISBN 957-29567-2-8(平裝)

1. 出版業 - 論文, 講詞等 2. 書業 - 論文,
講詞等

487.707

93010462

Net and Books 網路與書

《東亞四地 書的新文化》 *Building a New Book Road: Publishing in East Asia*

東アジアに新しい「本の道」をつくる

編輯委員：加藤敬事（日本）、郝明義（台灣）、劉蘇里（中國）、韓淇皓（韓國）

台灣版

封面設計：張士勇

責任編輯：洗懿穎

出版者：英屬蓋曼群島商網路與書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臺北市南京東路四段25號10樓之1

TEL：(02)2546-7799 FAX：(02)2545-2951

Email：help@netandbooks.com

網址：http://www.netandbooks.com

郵撥帳號：19542850 戶名：英屬蓋曼群島商網路與書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總經銷：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縣新莊市五股工業區五工五路2號

電話：(02)8990-2588、(02)8990-2568 傳真：(02)2290-1658

製版：瑞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詠豐印刷（股）公司

初版一刷：2004年7月 定價：台灣地區45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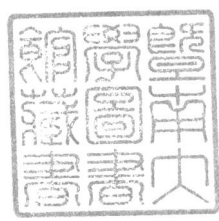
Printed in Taiwan

本書是 *Building a New Book Road: Publishing in East Asia* 的中文版，原書由「East Asia Publishing Project」與「大日本印刷株式會社」（Dai Nippon Printing Co., Ltd., Japan）協力出版。日文版在2004年3月8日由「大日本印刷株式會社 ICC 本部」發行，「The Book & The Computer Editorial Office」協助編纂，「Ichigaya (Tokyo) Office of TransArt, Inc」協助行銷。

256.1
200912

東亞四地
書的新文化
 Building a New Book Road
 東亞四地新書本道行文化

編委員：
 加藤敬子(日本) 郝明義(台灣) 劉蘇里(中國) 韓連潮(韓國)



《東亞四地 書的新文化》 *Building a New Book Road: Publishing in East Asia*

台灣序文：一種新的嘗試與地圖——《東亞四地 書的新文化》台灣版序 郝明義 5

日本序文：東亞共同出版計畫 津野海太郎 9

書簡往返：

社會變革期間閱讀之必要 加藤敬事、劉蘇里 15

韓國

特集：**從386世代開始邁向2030世代** 鄭丙圭／設計 25

評論：

從未來看過去——新韓國研究領導新方向 李權雨 41

有關出版的人和事：

蓋一個空中樓閣——李起雄編輯的「出版都市」 韓美花 47

韓國出版十年：

出版的花季——韓國童書、青少年以及人文書籍的成長 Kang Mark-sil 52

台灣

特集：**留住手藝——《漢聲》雜誌的傳統工藝記錄** 黃永松／設計 57

評論：

流行與嚴肅——兩岸出版交流的二重奏 徐淑卿 73

有關出版的人和事：

從過程中尋找意義——王榮文側寫 傅月庵 79

台灣出版十年：

彈指十年流變多——台灣出版的兩極化現象 徐開塵 84

日本

特集：**閱讀的人** 谷川俊太郎／詩、紀田順一郎／解說、平野甲賀／設計 89

評論：

我們的閱讀怎麼了？——更新閱讀的力量 加藤典洋 105

有關出版的人和事：

善良的無政府主義者——富田倫生與青空文庫 枝川公一 111

日本出版十年：

閱讀新定義——書、場所與人的關係 永江朗 116

中國

特集：**走向前台——中國的民營書業** 王焱／設計 I21

評論：

中國出版十年腳步——社會轉型中的出版生態 王一方 I37

有關出版的人和事：

「一本書主義」編輯人——汪家明 盧躍剛 I43

中國出版十年：

十年一瞬間——中國書業回眸 孫慶國 I48

座談會：

把傳統文化傳授給未來——東亞的文字、書籍和設計

杉浦康平、安尚秀、呂敬人（工藤強勝／設計） I53

隨筆：

東亞、東北亞以及韓國 白樂晴 I70

從「建本」到「台本」 南方朔 I72

日本人的同質性 中澤惠 I74

湧動的暗流 殘雪 I76

從「外」來的眼睛觀看：

在我想像中的東亞出版文化

東西文化的交流與探索 Roger Chartier I78

閱讀當代亞洲新思潮 André Schiffrin I79

打破東西文化的阻隔 Gordon Graham I80

中文與中文報業在泰國之興衰 Thanés Wongyannava I82

三十年韓國出版業見聞 Bruce Cumings I83

古今日、伊的文化交流 Mohammad Ali Sepanlou I84

俄羅斯的東亞文學新視野 Yury Maysuradze、Boris Esenkin I86

日本書文化和身分認同 Dorothea Rosa Herliany I87

對論：

東亞有共同的「書的文化」嗎？ 郝明義、韓淇皓 I88

一種新的嘗試與地圖

《東亞四地 書的新文化》台灣版序

東亞各地來共同思考書的文化時，不只在解答一些過去的問題，也在開啓一些未來的方向。

文·郝明義（「網路與書」發行人）

我是在2001年的法蘭克福書展上，第一次認識《書與電腦》的同仁。

《書與電腦》是大日本印刷公司旗下一個叫作「跨越藝術」（TransArt）的子公司所支持的季刊雜誌。大日本印刷公司不但在傳統印刷上居有領先地位，也毫不間斷地思考印刷和各種物件的結合以及出版品各種發展的可能。因而他們成立「跨越藝術」，專門研究並開發各種跨領域新的機會與新的可能。《書與電腦》就是由「跨越藝術」公司所支持經營。

《書與電腦》和《網路與書》創立時間相近，關注的方向也有相同之處，因而我們的交往開展得十分自然。後來再與社長津野海太郎進一步交往，更從許多方面發現彼此觀念相近。

後來《書與電腦》提出一個想法，希望邀請中國大陸、台灣、韓國、日本四地的編輯人共同策畫一本書，探討東亞這幾個地區有關書籍的文化正在發生什麼變化，然後在各地共同出版，我很高興答應參與。

經過一年多的時間，《東亞四地 書的新文化》終於完成。

一個綜合的視野

這本書的內容分兩大部分。一部分是有關書的出版的文化，在這些地區近十年來的發展異同，企圖從現實的橫切面來看書的文化；另一部分則是有關書的設計與閱讀的文化，企圖從歷史的縱切面來看書的文化。

前者的比重較後者來得大一些。

書的出版文化，近十年來的確在各地都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

以日本來說，從上個世紀九〇年代中期開始，長期苦於衰退。韓國，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之後，跌落谷底卻又急速翻升。中國大陸，在收收放放之間頗有輕舟已過萬重山之感。而台灣，則在整個九〇年代快速大幅的成長後，從二十一世紀開始，進入了某種盤整期。四個地區各有各的現象、問題與機會。如果能拉開一些距離，從一個綜合的視野來比較這四個地區，我們所能看到的，一定又和原先自己關注範圍所能看到的，大不相同。

看日本和台灣例子吧。

日本的出版業固然為長期低迷所苦，台灣出版業這幾年的日子，也沒有多好過。但是這兩地面臨的問題，有表面上相似之處，也有根本上截然不同之處。日本近十來年來雖然一路衰退，但不應該忘了他們過去享有的輝煌發展，原先已經站上了多麼高的一個水平。他們是站到了一個高度之後，再往下傾斜的。

台灣的情況，則完全不同。戰後台灣的出版業，雖然也可以分幾個階段，但是台灣出版業真正產生劇變的，仍然是以解嚴為分水嶺的九〇年代。從許多層面來看，九〇年代之後的台灣的出版業，幾乎可以說是新生的。這樣一個新生的嬰兒，會有十年令人目不暇給的成長，與其說是令人驚異的，不如應該說是自然的。相對而言，反而是台灣才成長了十年，就各種毛病一籬筐的出現，也要跟著別人高呼「出版大崩壞」，才令人大感意外。

如果說日本的出版業像是一個歷經各種成長階段後，體能正在走下坡的中年人，那麼台灣的出版業則像是一個少年人，暴飲暴食之後，正值青春年華之際，卻已經胃潰瘍纏身。

我們各有各的問題，互相需要彼此的借鏡與參考。

可供參考的出版座標

在比較近十年來東亞四地的出版文化上，《東亞四地 書的新文化》就是一種提供借鏡與參考的地圖，讓各地出版業者在相互的座標中找出自己位置與方向的地圖。這個地圖雖然還很簡略，但起碼已經用一種新的地圖方式呈現了。

看這幅地圖，不免深有感觸。

以韓國來說，我們可以看出他們近幾年來網路參與出版之後，在書籍結合網路這件事情上相當程度地超出台灣——韓國的網路小說出版成書後，暢銷冊數可達到五百萬冊（韓國人口四千五萬）；網路書店在2002年，就締造了每天高達相當於350萬台幣的業績。但另一方面，我們又可看出他們的社會雖然也是遲到1982年才准出版和馬克思相關的書籍，但是在九〇年代民主化運動取得巨大進展後，社科書籍與書店反而急速凋零的現況。

以中國大陸來說，我們看出他們在近十年來絢麗的發展，以及更將令人驚異的未來，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出他們仍然存在的許多禁忌，並可以想像未來等這些禁忌開放之後，也將面臨的許多痛苦與掙扎。

以日本來說，他們原來讓別人羨慕的一些特有的優點，後來卻變質，反而成了他們包袱。但是因為他們過去已經站上的高度，長期累積的閱讀歷史與動力，仍然擁有極為深厚的出版資源。

那麼台灣呢，在這個地圖上患了胃潰瘍的少年人，又在面對著什麼樣的問題與機會呢？

2003年，我寫了一篇文章，提出一些解釋：

1987年的解嚴，一方面撤消了政治的禁忌，另一方面也開放了社會。過去單一化的信仰體系與價值觀，一下子多元發展，出版與閱讀的叢林，藩籬盡除。……出版者急於填空，把過去因為禁忌而無法談論的作者引介進來，不得一見的書籍予以出版；讀者則急於補課，迎接從來只能耳聞的作家，購買過去只能暗地影印的作品。……四十年所缺的書，出版者和讀者急於在十年之內就補回來，是可以理解的，但卻是沒法實現的。所以一方面不論就出版者或讀者都產生消化的困難，另一方面也可以預期未來短時間之內這種大量出版的趨勢，並不會稍緩，而大量新書出版之後不及被讀者所認知、體會、接受，就又大量退回的現象，也不會稍減。（《閱讀的狩獵》。網路與書出版）

對於這樣的情勢，我認為不能樂觀，因為這一切的發展是不可能攔阻或減緩的；不過，也不能悲觀，因為我們所碰到的問題中，其實包含著一個美麗的錯誤——我們想把知識和閱讀彌補回來的急切。對於這一份急切，我們所需要給自己的，是多一些包容，以及多一些時間。

為什麼時間這麼重要？

原因很簡單。我們要補出的書還太多太多，而我們整個社會（包括出版業者、通路業者、讀者）要在出書前後補充的背景知識卻遠遠不足。這就好像叢林裡一塊廣大的荒地要補種過去未曾得見的樹木、花卉，就算樹苗、種子都急急地準備齊全了，但是要有足夠懂得把這些植物種下去的人；就算有足夠種下去的人，也真的種下去了，也得花上足夠的時間等待這些植物茁壯。這和這塊荒地開始重新開墾的時候，種下一點點新奇植物就能產生的效應和反應是大不相同的。

談到這裡，我們就可以想到，今天我們面對的，不只是近十年的出版文化問題，也和我們對待書籍更長久的歷史與文化相關。換句話說，與我們社會整體書的歷史與文化相關。

接續已然隔斷的傳統

東亞四地，原先有共通的書的歷史與文化。甚至可以說正因為借由書的文化，這幾個地區擁有互通的歷史與底蘊，形成一個可以稱之為漢字文化圈的地區。

然而從進入十九世紀中葉開始，西方文化全面進入東亞，一方面造成漢字文化圈本身的解體，一方面也讓各個地區與其過去的歷史和文化產生隔裂。

書的文化，當然更是如此。

書的文化，有內容與軟體層面的，也有形式與硬體層面的。兩者相互影響，互成表裡。這種書的文化的最主要特徵，就是輕柔，尤其和西方的書的文化相對比的時候。

進入十九世紀中葉之後，隨著西方文化進入我們生活中的每一個領域，我們的書的文化，起碼在表現的形式上，也完全告別了過去一千多年的傳統。不談東亞的書的文化有多麼悠久的傳承，我們今天所熟悉的書及使用的書，其實不過是才一百五十年左右的歷史。

因此，東亞幾個地區能夠在現在的出版文化之外，並共同探討更久遠的一些書的文化，有很重要的意義。這些探討可以讓我們跟已經隔斷的、曾經延續那麼長的傳統，有一個搭接的機會。這不只是讓我們彼此透過一些參考性的座標，互相對照出一個更完整的地圖，也可以像津野海太郎所說的，重新搭建出一條漢字文化圈可以共有的「書之路」。（請參見日文版序）

還不只如此。

不只東亞的漢字文化圈，包括西方在內的全世界，現在都站在一個書的文化要轉型的關口。書，因為以網路為主角的數位科技之出現，而站上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關口。

我們像是面對一扇門。門後，有一個新的應許之地。但問題在於，我們不知道怎麼開這扇門。過去，我們習慣開的是木製的門，不是拉的，就是推的。門上不是加了這種鎖，就是那種鎖。但現在我們面對的這一道新門卻完全不同——光滑平整，根本看不出門的要素，根本沒有可開的鎖。我們不知道該用聲紋，還是用瞳孔辨識，才能讓這扇門開啓。

東亞各地來共同思考書的文化時，不只在解答一些過去的問題，也在開啓一些未來的方向。

「書的新文化」，是一個重要的課題。能這樣展開思索，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很謝謝TransArt和《書與電腦》的嘗試。這些嘗試的本身，就匯入了我們想要觀察並使用的那幅地圖之中。

東亞共同出版計畫

這個實驗計畫只不過是一個開始，往後應該會有其他許多嘗試，在亞洲這個地區共築出一條互相了解的道路。

文·津野海太郎 譯·宇野義江



津野海太郎 Tsuno Kaitaro 《書與電腦》總編輯

1938年出生於東京。和光大學表現學院形象文化學系教授。從六〇年代開始以單行本、雜誌、Mini Communication 雜誌等多種形式參與出版工作。現為《書與電腦》總編輯。著作有《書會怎麼樣消失》(晶文社)、《新 與書交往的方式》(中公新書)、《滑稽的巨人》(平凡社)等。

超越國界的理解

東亞各地出版業者向來接觸機會不多，關係淡薄。直至近年，東亞各地出版人的來往開始密切，此書的合作出版計畫就於焉誕生。

如果可以的話，請您打開手邊的世界地圖，在中國大陸東北部凸出來的地方，是朝鮮半島。然後在東方的海上可以看到小小的島嶼，那是台灣島和日本列島——這就是我們進行出版活動的地方，也就是本書暫稱「東亞」的地區。就您所看到的，中國、韓國、台灣、日本，各地區的距離非常近，然而，就像在文章一開始所說，二十世紀後半約五十年，心理上分隔東亞出版人的距離又其實非常大。除了極少數的例子外，我們對彼此的面貌、工作以及觀點都不甚了解，也不求甚解。這種似近而遠的感覺，任何一位東亞地區的出版者都能感受得到。

大致來說，理由有兩個。第一、十九世紀後半，當時的日本帝國從軍事、政治和經濟各方面將勢力介入這些地域，將之變為帝國殖民地，這個狀況持續了一段長時間。第二、二次世界大戰後，中國、台灣和韓國三個地區，由於各自不同的政治因素，導致「言論與出版自由」上一直都緊緊地被捆綁。以上的因素產生出的結果，就如本書編輯委員之一，韓國出版人韓淇皓先生所說的：「上個世紀大部分的時間裡，國與國之間不是互相漠視，就大半在攻擊對方。在這種狀況下，共同的『書的文化』可以說是完全被遺忘了。」

然而，從二十世紀要邁入二十一世紀時，東亞出版者之間的關係開始慢慢建立。當互相的來往日漸加深時，我們終於開始察覺「從前的互不信任、互相漠視，原來並不是不能克服的」。假如沒有這個發現的喜悅，我們絕對不會想到由各國出版人共同來編輯一本關於東亞「書的新文化」的書，然後以不同的語言（文字）在不同的地區出版——這似乎是一時衝動，而且至今也沒有人實現過類似的共同出版計畫。毫無疑問，這個計畫只不過是一個開始，往後應該會有其他許多的嘗試，在亞洲這個地區共築起一條互相了解的道路，我們更希望能主動地參與這些未來的計畫。

文化史的取向

那麼，該怎樣編輯這一本書呢？我們認為有兩個方法：一、文化史的取向。也就是說大概從一千五百到兩千年期間，東亞地區一直都擁有共同的「書的文化」，我們試圖把這個集體記憶從睡夢中喚醒；二、傳播媒體方面的取向。就是以一些出版業者的經驗，報告目前東亞出版業的狀況，從而改變彼此間偏頗的觀念。

首先是第一個取向。東亞地區擁有共同的地域性特質，因而，彼此沒有國界之別，共有著與歐洲的形態大不相同的書籍。這樣的書籍，特徵有三：柔軟且輕的紙、使用大量漢字的書寫系統，以及雕版印刷。具體一點來說，就是以漢字寫成的稿子，雕刻在木版上，把它印在又軟又輕的紙上，然後把印好的紙疊在一起，再用紙捻把它釘起來——這就是在中國大陸誕生，繼而擴散到各地的東亞書籍傳統形態。

像這種書的形態之確立，是十世紀前半的事。在這之前，書還不是以雕版印刷，而是以筆抄寫的方式時，東亞就已經存在一條從中國到朝鮮半島、從朝鮮半島延長到日本列島的書的交易路線。此外，中國與日本之間還有一條直接的交易路線。中國浙江大學王勇教授對照通往西方的「絲綢之道」（Silk Road），將這條往東的路線稱之為「書之路」（Book Road）。從儒教或佛教的經典，到詩集，以及大眾的娛樂讀本，多種多樣的書經過

這一條「書之路」傳到東方各國。當然也有一些書籍回頭輸入中國。「書之路」繁華的盛況，連九世紀中國的詩人白居易，都曾舉出自己的作品集《白氏文集》的抄本流通最多的地方，除了中國的長安和洛陽外，還有新羅（譯註：西元七世紀中葉，統治朝鮮半島的古國）和日本呢。

然而，到了十九世紀以後，以歐洲為模式的現代化過程席捲東亞各國，東亞的造書傳統因此急劇消失。由歐洲造紙工坊所製又重又厚的紙，漸漸取代了原先又輕又軟的紙，古騰堡革命又讓銅質活字印刷取代了木質雕版印刷。

那漢字呢？我們不談歷史的經過，只看現狀好了。目前東亞各地的人，都使用不同的文字系統。台灣持續保留著傳統的漢字字形（繁體字）、中國則把它簡化成簡體字，日本也是使用簡略化的漢字（譯註：不過簡略方式和中國簡體字不同）和平假名與片假名混用；韓國則是捨棄了漢字，以一種他們固有的音標文字來取代，那就是韓文（Hangul）。然而，這種變化所產生出來的結果，也造就了今天我們四個地區，以四種書寫文字（包括英文則是五種）製作成這本書。

如果傳統性的紙和印刷技術的勢力衰退，甚至連漢字也……，那麼「以漢字寫成的稿子，雕刻在木版上，把它印在又軟又輕的紙上」所製造成的書、超越國界所共有的「書之路」的傳統，便只能說已經從我們身邊逐漸流失了。

但，不論現實如何，我們所共有的書文化的集體記憶，應該沒有理由完全消失。我們有沒有可能面對彼此，喚醒這個記憶、互相從記憶中挖掘出什麼呢？如果可能，甚至即便是確認不可能也好，這種努力對我們往後加深彼此之間的了解來說，也一定是好的。這也就是我們希望透過這本書實踐出來的精神。

傳播媒體的取向

不過再怎麼說，我們對彼此的現狀不了解的也太多。除了對照過去的記憶，我們是否還要消除目前互相的無知與不信任呢？有感於此，驅使我們走向第二個方向——傳播媒體的取向。

同樣是用「出版」這個名詞，但是我們所指的，例如出版社、印刷公司、流通機構、作者、讀者、編輯人、設計師、印刷造書的技術人員……所建構出來的系統，在各地區都有著很大的差異，儘管崗位一樣，但彼此之間卻有著不同的關係。以歐美為首的其他地區的情況固然也是如此，但是東亞由於彼此之間的距離小，區別卻那麼大，反而讓人覺得當中所蘊涵的現象特別有意思。

差異不只出現在出版機構而已。以2002年來說，中國初版的新書是10萬693種、韓國是3萬4549種、台灣是3萬4533種（2000年的統計數字）、日本是7萬4256種。不過這些數字並不能正確反映出，目前出版產業在各個社會上的高低位置。隨著彼此的往來增加，我們了解在各個地區，那個叫做書的媒體，其重要性有著極大的差異。這是我們當初沒有預想到的。而這個差異在日本以及其他三個地區顯得特別明顯。目前，日本出版人面臨著空前的困境，書籍滯銷不說，我覺得連書原本持有的力量也好像正在急速衰退。但是相反的，中國、韓國以及台灣的出版人，卻意氣風發、樂觀，讀者對書的信賴也還沒有減退——至少在身為日本出版人的我的眼裡是這樣。

從八〇年代到九〇年代，中國、韓國以及台灣，他們的社會都經驗了激烈的政治及經濟變動，各自的活力都是源自於和某些事情的關聯。

以中國來說，八〇年代過後，原本由國家所獨佔的流通機構經過「改革開放」政策，漸漸往民間移轉，到1996年，新聞出版署甚至讓圖書流通自由化了。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令，同年韓國發生全國性大規模的民主化運動後，政府發出民主化宣言，出版業終於取回了自由。然後1999年在台灣，自戒嚴令解除後還存在了一陣的出版法也廢止，出版報導完全自由化。日本以外的東亞各地到不久前才體驗了「自由化」、「民主化」的變動，所以說出版人以及讀者對出版業的看法那麼樂觀是很自然的事。

當然，問題並非完全不存在。東亞地區出版產業的「自由化」，有可能造成市場導向、純粹以經濟角度來衡量物品價值的觀念——「書要賣得好才行」。從八〇年代到九〇年代，日本出版產業經驗過來的，正就是這一種情況。而書籍的傳統文化要如何配合壓倒性的大量消費文化的難題，今天已經是除了日本之外，東亞出版界全體都得面對的大問題。本書的編輯委員之一，加藤敬事先生所說的「日本出版界所能提供的，是成功而後衰敗的經驗吧。其他國家能從這方面學到的東西應該不少。」這樣的諷刺並不誇張。

讀過本書後，應該可以知道在這一次實驗性的結果，是跟傳播媒體取向比較接近的。本書的編輯方向比較接近於雜誌形式，因此我們可以聽到的是編輯人生動的聲音，而不是研究者的歷史文化論述。目前，東亞出版業面對著激烈的改變，選取傳播媒體的取向，是理所當然的。不過這並不代表我們已經把舊的「書的文化」放棄了。事實上在這本書裡，以日本的杉浦康平、韓國的安尚秀，以及中國的呂敬人，這三位傑出的書籍設計師所進行「東亞的文字、書籍和設計」的討論，提出了好幾個今後我們必須共同思考的問題。這本書裡談到以漫畫為首的大眾文化，以及網路出版的部分太少，這一點我們也十分明白，如果下次有機會，一定會作更深入的探討。

開放給世界的新「書之路」

最後，對本書的構成與出版的過程簡單的做個說明。

這一項出版計畫在2003年春天，由日本《書與電腦》編輯室提出的。《書與電腦》編輯室是在「大日本印刷株式會社」的支援下，於1997年在東京創刊。《書與電腦》對出版人、印刷技術者，及後來的電子出版相關廠商等，提供了一個進行對話和互相教育的場地。我們的出版品包括：一本以季刊形式出版的雜誌《書與電腦》、一些有關出版和未來出版業電子化的書籍以及小冊子、由設在加州柏克萊另一個編輯部所構成的英文線上雜誌《*The Book & The Computer*》等。我們亦曾經主辦幾個關於東亞出版的活動：「亞洲的時空」展覽會（2000年）、「東亞出版人會議」專題討論會（2002年）等。

我們透過這些活動，認識了其他東亞地區的出版人，從彼此的對話中催生了這本書的計畫，已如前述。編輯委員裡三位銳氣飽滿的出版人（韓國的韓淇皓、台灣的郝明義、中國的劉蘇里），各自被視為出版界中年輕一代的改革者。日本的加藤敬事則是資深出版人，幫了很大的忙。就是這樣，我們這個主要以電腦連線來互通消息的編輯委員形成了。另外，我們彼此達成協議以2004年為出版日期，此書將由以下出版社發行五個版本：北京的「河北教育出版社」、漢城的「韓國出版行銷研究所」、台北的「網路與書」（Net and Books），這三家出版社各自以不同的語文來製作並發行當地的版本。日文版的發行則是由發行《書與電腦》的大日本印刷ICC總部擔任。至於英文版的出版，則預定在同年秋天。

電腦連線的編輯委員和《書與電腦》編輯部共同合作，首先建立了將全書分為三個部分的方針。現在您正在看的序文，以及中國和日本編輯委員之間的書簡往返就是第一部分。在第二部分裡，各地的編輯委員和他們所信任的設計師，各自製作了一個十六頁的專題特輯，內容是以各種角度報告各地區目前的出版狀況。最後，是超越國境的對話。第三部分的構成，包括前文所提的三位書籍設計師的座談、四位文化人各代表自己地區的隨筆、範圍擴大到東亞以外，來自世界各地出版人以及研究者所寫的文章，以及台灣和韓國兩位編輯委員總結的討論。

二十世紀後半的五十年，東亞各國的出版界各自都處於封閉的環境中，在這一點日本也不例外。要怎麼做才能克服由封鎖性所引起的、彼此相互的漠不關心和無知？能否用政治、經濟、軍事壓力以外的方式來突破呢？我們這個共同出版的計畫，是一個實驗性的嘗試。

但是我們嘗試的目的，並不是要將東亞與世界的其他地區隔離，以自己的獨立性來和以歐洲為中心的書的傳統對立。對於「書本」這個概念，我們已有一百五十年以上的時間，是以歐洲書的形態（稿子以銅活字印刷，把又硬又重的紙緊緊釘起來的東西）來思考、積儲知識、鍛鍊想像力，和不認識的人進行超越時空的對話。因此，再怎麼說，我們還是生活在古騰堡革命創造出來的書籍世界之內，硬要裝作自己置身事外，是不切實際的想法。而且我們現在正和歐美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的人們，一起體驗書籍世界因著數位革命、大量消費文化而開始搖晃的現實。怎樣才能超越「書本的危機」，在過去與未來之間形成不是斷絕，而是豐富的連續性呢？那不只是我們，是全世界所有出版人和喜愛看書的讀者，都正在面對的問題。

一起來為東亞創造新的「書之路」！本書就這麼呼籲各位。跟舊的「書之路」不同，新的「書之路」不是被一個強大的中心所支撐，而是有著多元化一，一化多元的複數中心。我希望這個新構造不只在東亞，也能夠擴張至全球，而且全球規模的書世界今後重新重組時，也能把古代到近代東亞書的記憶和經驗納入進來。其實，危機正是轉機，把目前我們面對的「書本的危機」作為契機，讓地球上栽種在不同土壤上的書的記憶甦醒過來、互相重疊、然後再匯合；從匯合上做出我們大家可以共有的、新的、書的形態。如果能有一天，那該有多好啊！

〔註〕

本文引用韓淇皓先生、加藤敬事先生的發言，取材自《書與電腦》九號專集〈東亞共同出版計畫〉。

社會變革期間閱讀之必要

從歷史中學習，以文化承接未來，不可無書。

劉蘇里
加藤敬事

譯·宇野義江

獨立專業書店的發展 劉蘇里

加藤先生，很高興參與這次中日民間書業交流活動。這樣的活動雖然不是創舉，但我依然看重它的意義。因為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近鄰，又有著如此長時間的文化交往歷史，作為後輩的我們能承續先人的足跡，為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做我們自己應該做的事情，首先不愧對先輩，其次有益於眼下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學習——當然最主要是我們學習日本同行的先進經驗。

能與加藤先生對話，也是我參加此次活動尤感榮幸的事情！

我所代表的機構是北京「萬聖書園」，創辦於1993年。是以學術圖書零售為主（包括一個圖書服務網站——www.allpagesbooks.com和客戶服務中心——主要是為有特殊需求的客戶設立的附屬機構），兼營圖書批發、出版以及文化交流活動等的商業公司。我們還投資成立了一家有一定規模的咖啡廳，叫「萬聖醒吾咖啡廳」。在中國大陸，萬聖書園是屬於零售店分

類中的獨立專業書店，以思想學術、文學藝術、科學文化類圖書的售賣為主。從其所堅持的定位以及持續的時間來說，萬聖書園都是國內最有影響力的書店之一。目前，它的營業面積為七百餘平方公尺，營業品種超過三萬三千種。批發以及出版業務隨著調整，已退居次要地位。



劉蘇里（北京萬聖書園董事長）

1960年出生，1993年創辦了北京「萬聖書園」，現任董事長，多年來一直支持言論自由。撰寫一個有關出版的評論連載於雜誌《書城》（書城雜誌社）。